



主 编 戴昭铭
副主编 周庆生

人类语言学在中国

——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IN CHINA

- ◆ 理论和方法
- ◆ 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
- ◆ 语言多样性与语言濒危现象
- ◆ 语言与文化
- ◆ 语言史与文化史
- ◆ 语言和方言的田野调查
- ◆ 语言政策、规划与应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人类语言学在中国

——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戴昭铭
副主编 周庆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语言学在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 戴昭铭主编. —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207 - 07315 - 0

I. 人… II. 戴… III. 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会议—文
集 IV. H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2812 号

责任编辑:崔佳斌

装帧编辑:于克广

人类语言学在中国

RENLEI YUYANXUE ZAI ZHONGGUO

——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戴昭铭 副主编 周庆生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E-mail hljrmcbs@ yeah. net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700 000

印 张 28.75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7315 - 0/H · 267

定 价 6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開幕式主席台

(前排左起: 趙阿平、戴昭銘、黃行、丁邦新、道格拉斯·帕克斯、衣俊卿、孫宏開、戴慶廈、周慶生、尹鐵超)



黑龍江大學校長衣俊卿致辭



大会会场



分会场报告

(报告人为黄行)



分会场讨论



閉幕式上戴昭銘與馬京交接下屆會議承辦權



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体代表合影(2005.1.6·哈尔滨)

人类语言学的当代意义(序)

戴 昭 铭

2005年1月6日至9日,由中国语言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和黑龙江大学联合发起的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黑龙江大学举行。会议开得很成功,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称道。会后我们从提交给大会的报告和论文中选编成了这本集子,作为会议的纪念性成果推给学界,俾使学界进一步了解这次会议,了解中国人类语言学的进展。作为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我想借文集出版的机会谈谈在策划和举办会议过程中的有关想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首先想要说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会?换句话说,为什么要召开一个以“人类语言学”命名的会议?

“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或“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是语言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或联系人类学而研究语言学,或从语言学入手而研究人类学,其中的“人类学”即为文化人类学。由于研究的对象在两门学科的交叉部,其侧重点在于语言与人类文化的关系。至于称“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主要与研究者的自我定位相关:若是人类学家去研究语言,习惯于把自己的成果归为语言人类学;若是语言学家借助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则喜欢使用人类语言学这一名称。至于二者的成果,其内容和性质则大抵相同。如果追踪这门学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国际著名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W. F. Humboldt, 1767—1835)的理论和研究实践。如果要述及这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则又离不开欧洲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K. Malinowski, 1884—1942)、列维-斯特劳斯(C. Levi-Strauss 1908—)和美洲人类语言学家博厄斯(F. Boas, 1858—1942)、萨丕尔(B. Sapir, 1884—1939)和沃尔夫(E. L. Whorf, 1897—1941)及当代一大批著名学者的贡献。这些内容在收于本书的姚小平、道格拉斯、张振江等先生的文章中均有详述,此处不必赘言。此处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周庆生先生的文章《中国语言人类学研究百年回眸》。此文是会前即在会议网站的“学科介绍”栏目中刊出的三篇文章之一,其中综述了中国语言人类学的百年研究历程及主要成果。周庆生先生把这些成果都归结在“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名目之下,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毋庸讳言的是,直至我们这次会议举办之前,在中国语言学界仍很少见到“语言人类学”或“人类语言学”的字样。长期以来,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人类语言学”只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有著名前辈学者傅懋勤先生撰写的条文,在

实际论著中却很少使用。^① 长期以来,周文中所述及的那些研究都分别被归于民族语言学、语言民族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学科名下。这种情形造成了一种错位或脱节:中国有人类语言学或语言人类学性质的研究,却不使用这一国际通用的学科名称。

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概念和科学术语是科学研究的有力工具。概念和术语的一致有利于学术交流和学术对话,概念和术语的歧异会造成交流的障碍和学术的隔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语言学在与国际学术接轨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许多语言学分支学科都大胆追赶国际潮流,及时引进国外语言学前沿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尽管在引进中“消化”和“结合”的问题解决得还不够令人满意,也是前进中难以避免的现象。然而唯独对于人类语言学或语言人类学名称的使用,中国语言学界却表现得相当谨慎小心,结果是不仅造成了上述错位或脱节,而且形成了中外人类语言学的隔膜:中国有人类语言学性质的研究,这种研究却不被国外同行作为人类语言学而知晓。比如我们此次大会邀请的首席嘉宾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人类语言学》杂志主编帕克·道格拉斯先生,他在大会报告中开场就说,在受邀与会之前他并不知道中国有人类语言学存在,来了以后才知道确实存在,而且做得相当好。这种隔膜的产生固然与以往交流不足的有关,但我们此前不使用人类语言学或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名称,无疑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由此可见,发起并举办以“人类语言学”命名的会议,有助于消除中国人类语言学研究与国外人类语言学的隔膜,有助于中外人类语言学的交流和对话,有助于中国语言学与国外语言学的接轨。这就是我们发起此会的初衷。因此,仅仅就启用了人类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而言,本次大会也是有意义的。

二

不过,与国际语言学接轨,对于使用人类语言学的名称而言,这只能算得上是必要理由,还算不得是一项充分理由。更为充分的理由是,相对于国内业已流行的民族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相关学科而言,人类语言学不仅更具有涵盖潜能,并且还能消除其他学科名称的局限性,把语言与民族、文化、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做得更好。

人类语言学或语言人类学隶属于广义的人类学。人类学研究人类本身及其行为,是一个包含极为广大的学科,一般分为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等4个部门。如果从1863年在英国成立的伦敦人类学会算起,这门学科已经有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在欧美,人类学是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研究部门之一,许多著名大学都设有人类学系或人类学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了从教学、训练、培养到研究实践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养成了深厚的学科传统,产生了一系列著名的人类学家及其代表性的论著。有的人类学家在政府部门兼任要职,对政府的决策或施政行为提供服务或施加影响;有的人类学家的论著本身就是政府支持的研究项目的成果。比如人们熟知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 1887—1948)的名著《菊花和刀》,就是当年美国政府委托和资助的一项研究成果,此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二战后的美国对日本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同时也因此成为

^① 这里说“很少”,不是说“没有”,比如:朱文俊《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2000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何俊芳《语言人类学教程》(2005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就是。

一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地位显赫,学科发达,当代文化人类学又因研究部门或方法的不同,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支,如哲学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社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发展人类学、心理人类学、感觉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结构人类学、科技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田野工作人类学等等。^① 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在欧洲已举办了十五届(第十六届将于2008年在我国召开)。这门学科的前景目前也是十分看好。

一门学科的兴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学科名称所涵盖内容的深广程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人类学”这一名称有极大的概括力,举凡与人有关的一切研究都可以包括在内。“人类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也可以作如是观。按照王宗炎先生的解释,“人类语言学”应当理解为“人类学的语言学”的简称。^② 尽管这一学科在传统上有一定程度的侧重于研究“落后”民族和无文字民族的语言的传统,然而既然称为人类语言学,那么从理论上讲,凡是一切与人类相关的语言现象或一切与人类语言相关的现象都可以纳入它的研究范围之内。由于从根本上讲,只有人类才有真正的语言,所以一切与语言有关的现象也必然只与人类有关,于是一切与人类现象相关的语言研究都是人类语言学研究,一切语言研究也就都可以归之于人类语言学的研究了。当然,由于人类语言本质的多面性,语言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有些语言学流派或分支(如形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等)不必归入人类语言学。然而即便如此,人类语言学所关注和涉及的领域仍相当广泛。像以下这些论题都是在人类语言学视野之内的:

语言的起源(包括一般的起源或具体语系、语族、语支、语群乃至方言的起源)

语言和思维,语言的特点和思维方式的特点

语言和思想、语言 and 世界观、语言和认知及人类知识

语言和社会文化,语言和人类精神

语言和民族、种族、族群、社群、阶级或阶层

语言和性别、职业、地域

语言和人类迁徙,语言的传播或远征

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语言扩散和语言收缩,语言的衰退、濒危和消亡

弱势语言、濒危语言的保护和记录,对新发现语言的研究

语言的分化、接触、统一或融合,双语或多语言现象

语言的地位、价值、功能、声望和生命力

语际关系和语言竞争

语言和国家发展及世界政治变迁,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

这些论题是随时想到的,未顾及逻辑关系。从这些论题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民族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有很多领域与人类语言学交叉重叠,但是如果仅仅使用其他学科名称而不使用人类语言学,总令人觉得于心欠安。

首先,“民族语言学”这个名称有些费斟酌。从字面上讲,“民族”是对“非民族”而言的。但是,既然世界上任何人都归属于一定民族,那么就不存在“非民族”这样一种现象。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人类学的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②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485页。

同理,既然任何语言都是民族语言,非民族的语言也是不存在的。语言间的区别只有民族的大小和人数多寡。有的语言仅属单一民族,有的语言由不同民族共同使用。然而,中国最大的民族语言是汉语,而中国的“民族语言学”是从不研究汉语的。固然,有些术语有约定俗成的意义,在我国,“民族语言”或“民族语文”习惯上已经指称汉语以外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不过一个民族在此国是少数民族,在另一国却可能是大民族、主体民族。比如俄罗斯、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等族就是这样的民族。然而我们的民族语言学是从不包括俄语研究的。这样,中国的“民族语言学”实际上等于是“部分少数民族的语言学”了。尽管它的研究范围与“人类语言学”有所交叉,但实际上要比“人类语言学”狭窄得多。它的合理位置,应当是“人类语言学”的一个下位分支。“人类语言学”可以包含“民族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却不能包括“人类语言学”。

至于“文化语言学”,它是一个在西方人类语言学思想影响之下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名称。其产生的外部动因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普遍发生的“文化热”,内部动因是人们对长期以来在结构主义(包括生成学派)理论和方法影响下的形式化的语言研究的不满,想把文化人类学的语言观和研究方法引进中国语言学。在上世纪80—90年代,文化语言学曾兴盛一时,形成过潮流,不仅影响到对汉语本体的研究,而且影响到民族语言学界、外语学界和对外汉语教学界。然而由于参与学者人数众多,在理论见解和研究方法上颇多分歧,难以归于一致。在理论见解上,多数学者与倡导者游汝杰先生大体一致,认为应当遵循罗常培先生当年提出的模式,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对语言单位的形成及语言的结构、功能、使用和演变的民族特点作出文化学上的解释。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文化语言学应当理解为“(文化+语言)学”,这样他们的文化语言学就等于一般理解的文化语言学加上语言文化学。^①如果说以上两种见解在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这一点上还可以获得共识的话,那么以申小龙先生为代表的“本体论”文化语言学则大异其趣。申氏认为百年来的“西化”的汉语研究完全背离了汉语特点,须全盘否定,并代之以文化语言学的汉语研究。申小龙的论著扩大了文化语言学的影响,但由于态度狂傲,观点偏激,学风也不够严谨,招致了众人的非议和激烈的批评,也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文化语言学的声誉。结果是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文化语言学发生了信誉危机,除早已发表的论著外,很少有人再敢标榜文化语言学研究。尽管我在90年代初曾是文化语言学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并曾出版过一本小书《文化语言学导论》,然而面对迅疾发生的学科颓势,也无可奈何。话说回来,既然人们不愿再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名称,而文化语言学本身缘起于对人类语言学的学习和借鉴,那么我们何不正本归宗,径用“人类语言学”这一名称呢?何况,就学科内涵而论,人类语言学可以包括文化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却不能涵盖人类语言学。使用“人类语言学”这一名称,可以坚持、深化和发展文化语言学最感兴趣的“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只要把这方面的研究坚持下去,至于叫不叫“文化语言学”其实无关宏旨。这些想法是促使我下决心发起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会议的最重要的原因。

还有“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联系社会研究语言,把语言看成异质有序的系统,着重于描写和解释语言的社会变异。人是社会性动物,不仅社会属性上的民族、社群、阶级、阶层、职业、地域等等特征变项对应于语言变异,就是自然属性上的性别、年龄差异也关联着语

^① 见邢福义主编、周光庆副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言变异。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看,一切语言变异都由人的社会属性变化引起,于是像性别、年龄之类本属自然属性的特征变项也成了语言的社会变项。在20世纪中期兴起于欧美的社会语言学,是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式化方法不满开始,通过吸收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人类语言学的思想和方法而形成流派的,其中自然有人类语言学的影子。在许多观念和领域上,社会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有重叠交叉,但相比之下,社会语言学更专注于语言的社会变异的研究。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W. Labov)关于纽约市百货公司职员言语中字母(r)分层现象的研究和英国语言学家特鲁杰(P. Trudgill)关于诺里奇市性别语言差异和潜在声望关系的研究,是具有广泛影响的代表作。人类语言学更为关注的无文字的、少数民族或土著人的语言及濒危语言,社会语言学则较少关注。由于在都市里社会语言变异现象较为明显而集中,社会语言学关注得更多的是都市语言,这样一来,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就在研究领域上显出了城乡差别。上世纪80年代,社会语言学在我国兴起,时间上略先于文化语言学,而形成潮流则在80年代末,与文化语言学同步偕伉。由于文化既是人类文化,也是社会文化,所以人类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际上难以划清界限,不少学术会议往往联手同堂举办,有的论著不仅内容兼具,而且书名也兼取。比如(中国)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1987·北京)的论文集名就是《语言·社会·文化》;(中国)第三届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1992·西安),会议中心议题为“语言与文化”,论文集名则是《语言与文化多学科研究》;又如文化语言学倡导者之一陈建民的代表作之一是《语言文化社会新探》,文化人类学研究者邓晓华的著作是《人类文化语言学》。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个连续统,许多现象是界限不清的,划界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既然本来并无明确界限,倘若硬要划界,效果可能牵强而徒劳。像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这样具有国际学术地位的学科名称,不如并存取便而用为宜。但社会语言学的地位在我国已经确立,而人类语言学的名称则尚少使用,需要加意提倡。这也是我们发起这次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有关想法。

三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的统一体,一直在学术研究中被当作两种对立的价值观。按照一般看法,似乎科学的事物一定不必有人文性,合乎人文精神的事物也不必使用科学证明。然而实际上,科学既然是人所创造的,也是一种文化,其中就不可能丝毫没有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创造的事物,也未尝不可以用科学原理来解释。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说法并非执意要混淆科学和人文实际上存在的疆界。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确实是:彻底的人文事物(如巫术和神学)确实欠缺科学性,而彻底的科学主义事物(比如克隆人)也确违背人性、人伦和人文情怀。

语言学中历来也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野。语言学中的理性主义“事物”,如为语言和就语言而研究语言、元素主义、彻底的结构系统观、理想的人所说的理想的(合乎“语法”的)话语、用有限的规则“管约”并“生成”无限可能的“真实”话语等等观念、概念或理论原则,就是科学主义的产物。假设的前提有一定事实为依据,就产生了强大的演绎能力和科学魅力,足以吸引一批研究者。毋庸讳言,理性主义的语言学成果累累,影响甚至已超出语言学界。然而同样毋庸讳言的是,当代的理性主义语言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沦为形式主义,

而且视野过于狭窄,只在少数甚至个别语种(英语)中进行研究以求取“普遍语法”,这种彻底的语言学科学主义,不仅确实带有被人恶谥的“语言学僧侣主义”的味道,而且就其置大多数语言的丰富事实于不顾的倾向,也真的已经成为一种“语言学帝国主义”了。确实,我们从当代理性主义语言学中很难看到对千百万人天天在使用着的众多语言发出的人文关怀的信号。

与当代理性主义语言学相对相反的是人类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继承发扬文化学和人类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关注世界上人类所使用的一切语言。不仅关注发达的或业已充分研究的语言,也关注或者说尤其关注“不发达”的、“落后”的、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或部族所使用的无文字的语言,特别是弱势语言和濒危语言。人类语言学家承认人类语言和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人文价值,认为任何语言,哪怕只有极少数人说的指日可待即将灭亡的语言,都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需要并应当施以力所能及的保护和抢救。他们不仅通过多年的身体力行进行了不少保护和抢救工作,而且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对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和抢救保存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世界语言的规划之中。相比之下,具有语言平等观念的人类语言学家面对弱势语言和濒危语言表现出了比理性主义语言学家更为充分的道义感和责任感,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更为广远博大的普世关怀精神,更合乎人文主义的基本准则。

诚然,在科学昌盛的当今,语言学应当科学化,而要科学化,就应当坚持理性主义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因此,对于理性主义语言学的科学主义精神,不仅不必轻率否定和反对,反倒是应当看到并承认其价值。然而问题在于,首先,世界是复杂的、多元的,语言学也应多元并存,不应只有一家一派;其二,不能误以为只有理性主义语言学才是科学的语言学,而人类语言学则是远离科学的,须知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即美国描写语言学正是在人类语言学的研究实践中,即在对美洲印第安语的调查中产生的,可以说描写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是一对孪生兄弟,而描写主义所坚持强调的对语言事实作客观描写的原则正是一种最基本的科学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被人类语言学家坚守着;第三,科学不仅仅需要假设和演绎,更需要描写和归纳,在某种意义上描写和归纳具有第一性的、实事求是的价值。如果不重调查和描写,就会缺乏基本的语言事实,假设和演绎的成果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流于主观主义。在语言学日益书斋化、思辨化、概念游戏化的今天,尤其需要大力倡导人类语言学关注一切语言、注重语言调查、重视语言描写、努力发掘语言事实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才能抵消现代语言学过于形式化的弊端,抵制少数学者仅仅依靠假设和演绎以小本钱做大买卖,仅靠少数几个例句就敷衍出一部著作的研究倾向。

在当代世界的新形势下,人类语言学凭借自身的务实传统和人文关怀,还可以开辟出学科发展的新境界。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出现了和平发展、多元文化竞争共存的新局面。然而与全球化、信息化并时共生的是文化霸权和语言霸权。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感受到了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语言文化的威胁。不仅原有的弱势语言更显其弱,原有的濒危语种更显其危,而且原先一度曾相当强大的语言文化群体也感到了地位的削弱和动摇。“文化帝国主义”、“英语帝国”的说法不胫而走,成为各国政要和有识之士心头挥之不去的魅影。坚持语言平等原则、保护弱势语种、抢救濒危语言、维护语言生态平衡、保障“语言赋权”(linguistic empowerment)等话题,既是人类语言学家出于道义和责任发出的呼吁,也是各国政要抵制英语文化侵犯、保护国家文化主权和语言主权的思想资源。如果说在上世纪70年代就存在过“欧洲的语言战争:字句可能折断你的骨头”这样的现象,那么在当代,一场遍布世界范围的

温情脉脉的语言文化战争已经揭开了序幕。语言中不仅有文化,还有经济,还有政治,语言的强弱兴衰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强弱兴衰。语言文化是“软实力”。在发展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的同时发展语言文化“软实力”,在加强语言文化自卫的同时主动“出击”,努力向国外推销自己的语言文化,是各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制订了国家加快向世界推广汉语的文化战略,加快了“汉语桥”工程和“孔子学院”工程的实施,可谓正当其时。

人类语言学家不仅是语言学的普世主义者,也是语言学的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人类语言学家反对一切语言霸权:既反对英语霸权,也反对其他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欺凌。人类语言学家的理想是所有语言文化都平等共处、和谐发展。世界语言有6 000多种,大多数现代国家都是多语并存。英语对于各种语言、各国中的强势语言对于相对弱势的语言都是一把双面刃,不可不用,又不可过用。那么,出于发展的需要,对强势语言的学习使用,与出于自身文化保护的需要对强势语言的抵制,其间应该怎样把握才能恰到好处地兴利除弊呢?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规划问题,而是语言政治的问题了。人类语言学能够对遍布世界的语言政治问题的恰当处理奉献智慧,以利于各种语言和平共处、和谐发展吗?

我们所希望的当然是肯定的回答。

(2006年7月于黑龙江大学)

目 录

人类语言学的当代意义(序)	戴昭铭 (1)
---------------	---------

理论与方法

人类语言学学科定位简论	[美]道格拉斯·帕克斯著 周庆生译 (3)
Aspects of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in the world	Douglas R. Parks (14)
族群关系与语言识别	孙宏升 (30)
中国语言人类学研究百年回眸	周庆生 (43)
洪堡特与人类语言学研究	姚小平 (50)
百余年间国外语言人类学研究的若干变迁——主要思潮	陆镜光 张振江 (54)
人类学背景下的言语和语言研究——论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视野	马 京 (68)

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

说“五”道“六”	丁邦新 (79)
语言接触与语言区域性特征	黄 行 (85)
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小陂流苗语的语言接触变异	戴庆厦 杨再彪 余金枝 (94)
中国工业化初期的语言接触和语言选择——以洛阳市的语言使用情况为例	杨晋毅 (104)
语言接触和杭州方言的文白异读	徐 越 (120)
香港开埠初期的族群语言竞争与选择(1841—1884)——基于族群语言活力	
理论的解释	张振江 陆镜光 (131)
香港两文三语教育架构的历史回顾	陈立中 (146)

语言多样性与语言濒危现象

关于语言多样性问题跨学科研究的综述	冯小钉 (157)
论濒危语言问题的普遍意义	徐世璇 (161)
仡佬族母语的发展趋势以及应对仡佬族母语危机的基本措施	周国炎 (168)
台湾泰雅语的语言流失、转移与振兴——以新竹尖石水田部落为例	陈淑涓 江文瑜 (176)

- “五色话”使用现状及其濒危的原因 韦茂繁 韦树关 (199)
濒危状态的赫哲语 何学娟 (202)
应予关注的“另类濒危语言”:民间隐语行话 曲彦斌 (207)

语言与文化

- 人类学视野中的语言与文化 徐杰舜 (215)
蒙古语鸟名称与蒙古族鸟文化 斯钦朝克图 (221)
壮语通用词汇中的动物名词音义关系考察 刘兴均 (238)
从蒙古网站看蒙古语词汇的变化和发展 姚克成 (249)
文化视角下的汉语和蒙古语的某些称谓词 哈斯巴特尔 (255)
Prayer in the Culture of the Lakota (Sioux) Indians of the North American Plains:
An Ethnolinguistic Inquiry Raymond J. DeMallie (266)
Buryats, Buryat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Russia: Problems of Modern Ethnolinguial
Self - Identification Dykheyeva Galina (270)

语言史与文化史

- Language and Identity for Aboriginal People of Northern Canada
..... Robert Wesley Heber (273)
白语系属研究献疑 袁明军 (279)
吴方言与苗瑶语 刘援朝 (286)
从浙南地名看温州的移民文化 盛爱萍 王建华 (299)
“方言”考 李先耕 (308)
满族口头文学文本中保留的满语 汪立珍 (316)
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的人类学价值及发展 赵阿平 (322)
中日汉字探源三题 何华珍 (328)

语言和方言的田野调查

- 内内蒙古语使用现状调查的初步结果 照日格图 (337)
从单语区到多语区的历史演变——深圳南岭村的社会语言变迁调查
..... 汤志祥 陈永康 (342)
玛曲藏语指示代词的认知特征 周毛草 (352)
东北官话词汇研究的人类语言学视角 尹世超 (361)
从吴语靖江话的“快”看方言研究中的历史人文背景 冯 力 (373)
甘肃通渭方言的特点及其历史成因 刘登甲 (378)

语言政策、规划与应用

全球化、英语霸权和中国的语言教育政策——对英语扩张的人类语言学透视	戴昭铭 (385)
内蒙古蒙古语授课中小学个案研究	兴安 (394)
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沿革对我们的启示	刘汝山 (400)
突尼斯共和国的语言政策	白少辉 (408)

附 录

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戴昭铭 (419)
人类语言学在中国大有可为——在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戴庆厦 (420)
在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衣俊卿 (422)
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	黄行 (424)
中国首届语言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评估报告 道格拉斯·帕克斯提交 周庆生译	(426)
贺信、贺电	(433)
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报道)	史维国 (436)
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史维国 (439)
后记	(447)